

长篇小说选刊  
— 21世纪 —  
新经典文库

# 极 花

贾平凹——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---

# 极花

贾平凹 / 著

---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花 / 贾平凹著. —成都 : 天地出版社, 2017.6

(21世纪新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2721-6

I. ①极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0592号

# 极花

出品人 杨政

著者 贾平凹

责任编辑 张秋红

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

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
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：610014)

网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
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
电子邮箱 [tiandicbs@vip.163.com](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)
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61千字

定 价 32.0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721-6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：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：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浩荡的民族新史诗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

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：“‘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’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、民族、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。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，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，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，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，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。”

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，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，也是作家、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，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“史诗”的一种文体，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在中外文学史上，无论是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，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，

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，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、情感及其变迁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。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新兴的“人民文学”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，并在建国初的“十七年”中进一步发展，赵树理、柳青、丁玲、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，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。新时期以来，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，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

新世纪以来，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。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，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（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），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。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，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，不仅在国内流传，而且跨出国界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。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，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、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，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。

《长篇小说选刊》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，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，披沙拣金，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。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，一部流动的文学史。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，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，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

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。

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从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，辑成“21 世纪新经典文库”，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。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，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，勇攀高峰，努力创造“中华民族新史诗”。

## 实而虚 轻而重 ——一朵精神极花的存与亡

王俊

一部不大同于以往的《极花》又问世了，贾平凹依然在他探索性的写作道路上跋涉着，拿着历史的索魂棍和时代的探照灯，在乡间粪土与陈尸亡灵中索取着养分，以微弱的磷光照向这惶惑不安的当下和未来。

如果说《带灯》中的带灯，还是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的萤火虫，那么《极花》里的胡蝶，却成了更加卑小低微的毛拉虫儿，到了冬日就休眠而死，夏天里，即便长成草开了花，也是要被晒干了卖的。

贾平凹的写作，一直都在一种矛盾的立场上理性而混沌地前行着，他的两难，似乎总在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之间纠结着。这种纠结，并不是要做出一种终极的选择，而恰恰是和盘托出式地呈现这种两难的状态。也正因如此，贾平凹的小说构建，有轻重，有虚

实，既有细碎，又有浑成，细碎而愈加浑成。《极花》就是一部于细碎中求浑成、越细碎越浑成之作。

《秦腔》以来，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就写得越来越密实，越来越多地以丰富的事实、经验和细节来密不透风地构建着，但可以明显地看到，构建本身并不是他的本意——正如四面墙确实需要一块一块的砖混合着水泥沙子而垒起，但垒它的人并不仅仅是想要垒四面墙、垒一座房子，而最终是要建造一个家园。贾平凹想要构建的，正是他广阔的意蕴空间。

如此，他虽然越写越实，却也越写越虚了——砖越垒越实，空间便越来越空虚充盈了，纤细而气益闳，填塞而境愈廓——仅在《极花》开头进入的前五段里，连“我”在内，就提及了11个人物之多，这种密实的主观的自说自话而实实在在的叙述，让人总得静下来再静下来才能听到“她”在说什么。可看着看着，你又会发现，务虚才是他的拿手好戏，“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，地下的区域划分为分野，天上地下对应着，合称分野这你不知道？”

是了，贾平凹的述说就如同老老爷，一开始便认定了你是知道的，才说给你听。可其实，“我”还隔绝在一座幽闭的窑里，看不见什么星空分野。他在自己的神秘感、生存和死亡体验中，用务虚的笔法，写着这个偏僻、荒诞、穷恶的村子里，男人以如何的代价拐卖着女人，而女人以如何的血泪卑微地生存着，血葱如何繁盛而极花日渐稀罕，白云白得像白牡丹而土豆顿顿要填进肚子里去，刻石寄托着沉重的现实而剪花通灵般纤巧轻盈。在这样的故事里，他依然不忘提及那些如今已经消失许久的野物——狼、狐狸、野马、野驴、黄羊和獐子，它们在这里还没有消失。它们让自然生态和人

文生态紧密相连。这也足以窥见写作者的内心，依然保存着对世界、对死亡、对大自然、对神秘事物的一种敬畏。

敬畏心重如山石，他的笔触却轻如干花，可以随空飘荡，也可以顺风顺水；思考和要承载的东西越来越重，就重如瀑布，让每一个读者，也成了他那样，像是“拿碗在瀑布下接水”。

我们都是时代的焦渴症患者，怎么接，都是不满，不去接，又焦渴难耐。我们的碗，负担不起这么宏大这么一泻而下的气势，负担不起时代的泄洪之水。我们只能退而远观，“遥看瀑布挂前川”。

“现在小说，有太多的写法，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、很极端的叙述。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，但我却就是不行。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，以水墨而文学，文学是水墨的。”（《极花》创作谈）一张瀑布挂在那儿，要追求中国式的真实，就得写意。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，它既不是理性的，又不是非理性的。

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，传统与现代之间，如何就有了“将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相平衡、相综合的大气象”（谢有顺语），从来就不只是两难的问题。虽然，小说中的胡蝶最终面临了两难：她是要娘还是要孩子？如果娘有了孩子，而她的孩子又没了娘。这是一个荒诞的寓言。在中国这几十年的进程中，我们是要保住传统的根茎、文化的源泉，还是让时代的车辙碾压而过，顺应一切发展的趋势而动？我们是要倾听上一代的哀声，还是着想下一代的未来？是什么，把这看似对立的二者纠结在了一起？

贾平凹的如椽之笔，不是在被动地做着选择题，而是深具对于现实的反问能力——“我们的作品里，尤其小说里，写恶的东西都

能写到极端，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？”反问而没有答案，他只是依然真力弥漫，拿捏着虚实轻重，笔法于老辣中见温柔，于温柔中见辛酸。

《极花》中，别处有极草，这里有极花；它索蝶而去，又濒临绝迹；那个已故的生出了黑亮的女人，却长得干净，性情安静，是个“人样子”。

【作者系贾平凹文学艺术馆馆长助理】

## 不是我在写，而是她在说

贾平凹

十年前一夏无雨，认为凶岁，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。他是个结巴，说话时断时续，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。那时的蚊子很多，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，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。

人走了，他说，又回，回那里去了。

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，他抬起脑袋看我，目光空洞茫然，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。他说的人，就是他的女儿，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拾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，便被人拐卖了。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，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，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。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，是鬼，鬼都慌乱啊！他老婆还是在哭，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，骂道：哭，哭，你倒是哭，你妈的×哩，哭！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

子砸去。我没有拦他，也没一句劝说。桌子上还有一个碗，盛着咸菜，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桶做成的花盆，长着一棵海棠。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，那天，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，我看到他女儿正往塑料桶里装土。我赶紧把咸菜碗、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，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。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，是女儿回来后，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，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，女儿被人围观，指指点点，说那个男的家穷，人傻，屎多，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。从此女儿不再出门，不再说话，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。我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，便托人说媒，希望她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，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。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，女儿不见了，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。

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。

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，每每一想起来，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。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，十年了，她又是怎么个活法。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，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，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拾破烂，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，头发稀拉，身子都佝偻了。前些年一见面，总还要给我唠叨，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，在高原上，风头子硬，人都住在窑洞里，没有麦面蒸馍吃。这几年再见到他，他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。我问了句：你没去看看她？他挥了一下手，说：有啥，看，看的？他不愿意提说，我也就不敢再问。以后，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，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，也去过咸

阳北部的彬县、淳化、旬邑，那里都是高原，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，脸色黑红，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，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，趔趔趄趄，我就想到了她。在某一个村庄，路过不知谁家的硷畔，那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，有驴有猪，鸡狗齐全，窑门口晒了桔梗和当归，有矮个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饭，而女的一边给身边的小儿擦鼻涕，一边扭着头朝隔壁家骂，骂得起劲了，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，我就想到了她。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个村庄去的路口，一个孩子在草窝里捉蚂蚱，远处的奶奶怎么喊他，他都不听，奶奶就把胳膊上的篮子放在地上，说：谁吃饼干呀？谁吃饼干呀？孙子没有来，麻雀、乌鸦和鹰却来了，等孙子捉着蚂蚱往过跑，篮子里的那包饼干已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骨头，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来的一颗牙，她要带回扔到自家的房顶去，不知怎么，我也就想到了她。

年轻的时候，死亡对于我，只是一个词语，一个概念，一个哲学上的问题，谈起来轻松而热烈。当过了五十岁，家族里朋友圈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，甚至父母也死了，死亡从此让我恐惧，那是无言的恐惧。曾几何时报纸上电视上报道过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，我也觉得那非常遥远，就如我阅读的外国小说里贩卖黑奴一样。可我那个老乡女儿的遭遇，使我在街上行走时常常就盯着人群，还怀疑起了某个人，每有亲戚带了小儿或孙子来看我，我送他们走时，一定是反复叮嘱把孩子管好。

我出生于农村，十九岁才到西安，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和一个妇联干部交谈，她告诉我：经调查，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。我记得我当时目

瞪口呆。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，我去过一次公安局，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的具体数量无法得知，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，但确凿的、备案的失踪人口有数千人。我也是目瞪口呆。

留神了起来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，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。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，让人想得最多的是他们被拐卖了。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，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？偷抢金钱可以理解，偷抢财物可以理解，偷抢了家畜和宠物拿去贩卖也可以理解，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？社会在进步文明着，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，为什么呢？

中国大转型年代，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潮，进城去，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。就拿西安来讲，这是个古老的城市，满城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，他们衣着整洁，发型新潮，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，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，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。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，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。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，过上了好日子，而更多的却漂着，他们寻不到工作，即便寻到了也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，但他们不回老家去，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，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。其实，在西安待过一年两年也回不去了，尤其是那些女的。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发一号文件，不断在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，靠那些空巢的老人、留守儿童去建设吗？我们是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，

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，有党员活动室的牌子，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，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、自然生态好的、在高速路边的地方。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，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，却无法娶妻生子。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，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，有一个跛子，他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，他说：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，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。我无言以对。

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，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，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，可往往越是卑微的生命，如兔子、老鼠、苍蝇、蚊子，越是大量地繁殖啊！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，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，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。记得当年时兴的知青文学，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，让他们受苦受难。我是回乡知青，我想，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吗？那农村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？拐卖是残暴的，必须打击，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，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，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，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，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？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，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？或许，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，或许，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。

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呢？

但是，这个故事，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。怎么写呢？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，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，又如何被殴打，被强暴，被威胁着要毁容，要割去肾脏，以及人贩子当

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？写她的母亲在三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，父亲听说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，为了去打探女儿的消息，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，终于有了线索，连夜跑一百里山路，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？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，为了缓解矛盾，假装认亲，然后再返回西安，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，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，他又如何在收拾破烂时偷卖了三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六个月的牢？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，双方打斗，派出所的人伤了腿，他头破血流，最后还是被夺去了孩子？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，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，如何思念孩子，又回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？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。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，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，比如上访，比如家暴，比如恐怖袭击、黑恶势力。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，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，那里坍塌了什么，流失了什么，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，是可怜还是可恨，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，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。

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，使我曾经是那样激愤，又曾经是那样悲哀，但我写下了十页、百页、数百页的文字后，我写不下去了，觉得不自在。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，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？拿碗在瀑布下接水，能接到吗？！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，什么都想夹来尝尝，我也知道我敏感，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，我就能闻出来，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。于是我得重新开写，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，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，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？

现在的小说，有太多的写法，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、很极端的叙述。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，但我却就是不行。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，以水墨而文学，文学是水墨的。坦白地讲，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的，喜欢着水墨画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，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，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，以后的几十年里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，做我文学上的活儿。如今，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，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，发生了巨大改变，我们习惯了的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。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，但无法找到，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。在陕西，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，写他常常怀念母亲，他母亲是世上擀面最好的人。文章发表后，许多人给他来信，都在说：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是我妈！我也是这样，但凡一病，躺在床上了，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，可母亲去世多年了，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。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，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，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，竟然受益颇多，于是回来都做笔记，有些是我的感悟，有些是高人的言论。就在我重新写这个故事前，在一次论坛上，我记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
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、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，不能漠然于现实，不能躲开它。和其他艺术一样，也不能否认人和自然、个体和社会、自我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。假如你今天还是画花鸟、山水、人物，似乎这两百年剧烈的、根本的、彻底的变化没有发生，那么你的作品就是脱离时代的装饰品。不